

拿得出手就行了的，不一定非要寫得怎麼好。所謂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只是陳義甚高的「目標」，實際上一般講求的還是「票房價值」，所以，「叫座」才是必要條件，「叫好」則充其量不過是個充分條件而已。而且文章也不一定非要有創見不可，張愛玲這篇文章說不定是跟着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精神來的呢。再說張愛玲之成為名作家，「說故事」一向是她的長處之一，如今這樣寫法，也算是「善用其長」了。唯一的差別只是以前張愛玲說的是她自己寫的故事，現在說的是人家寫的故事而已。

何況這篇東西還好在有兩點很合時下的「風尚」！

其一是這樣「長話短說」式寫故事大綱摘要，怡和大部份報章雜誌競相爭載的暢銷書摘相近，完全符合工業社會講求「精簡」的原則。

其二是邇來作家也都像畢卡索晚年一樣講求「稚拙」起來。研究所的大男生要作小女兒狀，十餘年前點過「智慧的燈」的女作家，也有「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新面貌，那麼享譽文壇數十年的老作家，寫出生式的讀書報告來，想必是「大勢所趨」的緣故。因

為古語說：「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可沒提到作家也如是哩。（白西野）

有理的與無理的

讀「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這本書收集了八篇英美學者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委員會編譯印行。這樣的書，在目前來說，還是破題兒第一本。不僅是第一本，其中的八篇文章，都各具特色。

「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Patrick D. Hanan 著，張保民、吳兆芳合譯)拿元明兩代的白話小說當作文學體裁來研究。「中國通俗小說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Robert Ruhlmann 著，朱志泰譯)則把通俗小說和戲劇中的人物角色當作歷史進展中的文化力量來研究。從這兩篇，也可發現中西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重點相異之處，中國學者向來比較着重文言文，喜歡評論詩文，西洋學者比較着重語體文學，喜歡評論小說戲劇。

「求宓妃之所在」(David Hawkes 著，黃兆傑譯)採用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楚辭和漢賦，闡明辭賦與古代巫術及封禪觀念的關係。「簡論詩經第二百二十首」(George A. Kennedy 著，孫述宇譯)用此詩與詩經中其他篇章為資料，討論語言學上的疊字問題。「十四世紀詩人高啓」(Frederick W. Mote 著，趙令揚譯)就高啓的詩來討論作者以及同時代同背景的人。可見西方文學研究已漸與其他學術研究溶滙。一則文學成為其他學術研究的資料，一則其他學術研究的資料與方法也吸收到文學研究中來。

「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James R. Hightower 著，宋淇譯)將中國文學與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學相比較，評定它的價值。「中國文學的局限」(Avrur Waley 著，李棣譯)是作者所譯「百七十首中國詩」的前言，實即中國詩之極限，可略窺英美人士對中國文學的評價。

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世界馳名的漢學家，論文也頗具代表性。有理的，如「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析論表達語態，比較單體布局與連合布局，國內似尚未見人論及；無理的，如「中國文學的局限」中所謂

「中國四世紀後沒有女詩人」，「中國詩中沒有愛情」。無論有理無理，我們在研讀本國文學時，要是有機會知道外國學者的一些觀點和意見，自可開拓眼界。(思兼)

另一種慚愧

看「綜合月刊」，皇甫河旺編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一日出版

九月號的綜合雜誌有不少篇好文章，譬如尹萍和翁台生聯合撰寫的「紅衛兵談人性的覺醒」，透過這篇專訪，我們瞭解到在毛共統治下受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內心的徬徨和寂寞，「文革」初期，許多年輕人還抱著一種理想，認為真的如毛澤東所說，是去「揪出那一小撮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人」，把不是真革命的當權派拉下來，後來他們發現「文革」派系林立，不斷的互相鬭爭、殘殺，這使得他們很迷惑，到底「文革」的意義是什麼呢？紅衛兵們不久終於自覺到他們不過是被人利用作為相鬭的工具罷了，每個人的生命連螞蟥都不如，於是只有選擇最後一條路：逃出大陸，